

小账本见证国家发展

■董淑萍 口述 周率 整理

我的父亲董万春是丽水县人,出生于1925年,1949年参加工作。我母亲张春晖,金华浦江人,出生于1932年,1952年参加工作,今年88岁。他俩于1953年底在缙云县结婚,分别在缙云县商业局和供销社工作,婚后育有4个子女。我是家中的大女儿,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生活所迫开始记账

父母结婚时的新房是租住的民房,七八个平方米,仅能放下一个木箱、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连转个身,都免不了磕磕碰碰。我父母都上班,每个月共有工资93.5元,日子过的还算充足。但4年后,父母有了3个孩子,不仅住房一下子紧张起来,更要命的是工资也不够用了。

父母因为工作关系需要经常下乡出差,顾不上照顾孩子,孩子往往刚满月,就请保姆照顾,光3个孩子的保姆工资,每月就要花去29元。再加上双方老人的赡养费,占了一半工资,手头吃紧,经常是人不敷出。为此,父母经过商量,决定要做到有计划用钱,不浪费一分钱,事前有规划,日常有记录,对家庭每日消费作记录,以便控制开支。

于是在1957年1月开始,每天记家庭现金收支日记账,没想到他们当年的无奈之举,竟坚持不懈地记了60多年,为家庭和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档案资料。

父母在未离退休前,都是每天晚上记账;离退休后则是随时记,做到月结月清,一年一总结,从1957年到2018年共61年没间断。我父亲在2014年去世后,我母亲也一直在接着记账。

现存家庭收支日记账,除1957年到1960年4年只有分年月收支存总账,日明细账丢失外,其余年份的账本全部保存完整,共有账簿50余本,基本为两年或三年一本。同时,为了有计划用钱,从1957年至1980年共24年间,每年前都作了支出规划。这些账本记录下我们全家详细的经济活动情况。由于父母有健全的现金收支账,1981年至1990年共10年,被缙云县人民银行列为记账典型户,按月向银行填报分类收支存月报表。



父母记录的收支账本

家庭收入持续增长

1957年,父母一年的收入是1191.75元,其中工资及补贴收入1122元,占总收入93.76%,靠工资收入是主要来源。全年支出1068.28元,占总收入98%,年终还有节余。支出中购买商品支出507.73元,占总支出47.53%,非商品支出560.55元,占总支出52.47%。非商品支出中,主要是3个孩子的保姆费每年330元,赡养双方父母每年156元,这两项支出486元,占工资收入的43.31%,但经过精打细算,当年还节余123.47元。结婚后4年多,年年有节余,累计节余376.71元,其中公债100元,储蓄240元,手头现金36.61元。以1957年为基础,与以后各时期变化对比,我们家的收入翻了几番。

1978年以前工资增长很慢。1980年时,工资增加不少,父母月工资达到142.60元,月工资净增33.10元,比1978年增加了36.30%。到2004年月工资为3508元,比1957年增长36.5倍,比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月工资126元,增长了26.8倍。由于工资成倍的增长,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使我们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2012年,父母两人每月离退休金比1979年工资增长了95倍,平均每年增加330元。支出结构方面:1961年,食品支出占总收入59%,1970年占50%,1981年占35%,到了2008年,只占13%。

改革开放带来物质文化生活大改观

改革开放前,由于收入低,人口多,生活改善比较慢。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国力增强,工资不断改革,职工收入有了较大的增加。因此,在住房、家具、家用电器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并随着生活要求不断提高,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更新换代,这些变化也都能在账本中得到体现。

父母亲结婚时的新房是租住的旧瓦房。他们婚后随着子女的增加,曾搬过18次家,其中9次是租住民房。租住面积最小为8平方米,最大的还不足20平方米。1994年房改,父母利用多年积攒的钱和借款,购买了单位的房改房,有近90平方米,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住得宽敞舒适。2010年,父母俩还花50多万元在丽水市区买了一套老年人公寓。此后,他俩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夏天住缙云,其他时间都住在市区的老年人公寓。

听父母说,他们结婚时,全部的家当只有从家里带来的旧棉被、旧床单、旧蚊帐,还有一只小木箱,所用的桌凳椅等全是公家的。结婚时没有婚宴,也没有婚嫁,只是单位工会开了一个唱唱跳跳的联欢会。1970年才添置了一个碗架,1972年请木工做一些家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年购置齐全家具。为解决全家人穿衣问题,父母省吃俭用,1969年花了116元,买了



父亲董万春与母亲张春晖

一台缝纫机,使用至今。因工作需要购买了一块手表,但一块手表两人一个月工资还不够,只能在1962年花了60元买了一块旧手表。直到1975年和1976年分两次才买到两块上海牌新手表。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兴起“新三件”,即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1987年,父母花403元买了一台半自动的洗衣机,2000年花1750元更换为全自动的洗衣机;1979年花232元买了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1987年花391元换成14英寸黑白电视机,1991年花2500元更新为21英寸彩色电视机,1998年花1950元再度更新为25英寸彩色电视机。父母还陆续买了电冰箱、收录机、电唱机、电子琴、照相机、VCD、空调、微波炉、取暖器等电器。就这样,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物资的丰富,父母家有的各类家用电器也是在不断升级换代,生活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比,真是天壤之别。

2011年7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开展“寻找共和国记账人”活动中,我父亲董万春因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记账的事迹,被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作为浙江的代表推荐到国家统计局,被国家统计局授予优秀基层记账员。因此,父亲也被称为

“共和国记账人”。

三代人记账 传承节俭家风

在父母的影响下,我是1973年开始记账的。当时我在缙云县凝碧村当知青,因国家每月会发给知青5元补贴,这是我的第一笔收入,于是我也开始记账。如今我也坚持记账45年了。我的女儿2005年也开始记账,但她的记账方式,已不再是像我以及我的父母那样,用手写记账,而是采用支付宝的记账软件。

从2012年开始,父母陆续将这些账本捐赠给了丽水市档案馆,希望这些账本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近些年,《浙江日报》《钱江晚报》《丽水日报》《处州晚报》等,陆续报道了父母坚持记账60年的新闻,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影响。2017年,安徽卫视的记者还特意到丽水来拍摄,并邀请我到合肥参加了由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主持的《家风中华》专题节目。如今,我们全家已不再是节约而记账,正如我母亲曾说的:“我们原来记账,是因为生活困难,后来记账越来越有趣。”

作者董淑萍系丽水市统计局原局长,周率系丽水市档案馆馆员、市政协文史专员。

三进利山看变化

■叶松青

2018年夏季,我与莲都区政协文史委主任黄建兵等人一起来到了大港头镇利山村,接待我们的是前任党支部书记徐连发。连发的家就在村口大樟树旁,门前便是五十余亩的莲花园,环境十分幽雅别致。在连发家宽敞的“大洋房”里,通过回顾我三次进利山村的亲历、亲见,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莲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一进利山为“分山”

我第一次进利山村是1982年秋季,那时我的身份是雅溪区公所副区长,那次去利山的目的是给农民分“自留山”和“责任山”。

1982年秋天,中共丽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在大港头镇搞“进一步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全县五个区分别由一名分管林业生产的副区长带队,并抽调三至五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负责一个村的林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工作。我们雅溪区公所负责利山村,城郊区公所由副区长兰宝兴带队负责栋村村,碧湖区公所由副区长张一心带队进驻石侯村,全镇所有村都有工作队进驻负责完成这项试点工作。

我们到了利山村后,组织安排住在村民徐根发家楼上。徐根发本人是榨厂职工,爱人是利山村村民,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也比较清洁和宽敞。吃饭安排在雷石生家,雷石生家只有两口子,比较清闲,所以安排我们工作队四人在他家搭伙。那时搭伙得交钱与粮票,镇里没有任何补贴,我们每天交1.2斤粮票与三角钱人民币。生活十分清苦,吃的是地瓜丝饭与地瓜丝稀饭,清一色农家土菜,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油味,就连支部书记徐宝成同志请我们喝一次酒,下酒菜

就是单一的炒黑芝麻。

那时的农村生产十分落后,群众说是“一大、二公、三空”。生产队出工时是“一条龙”,收工时是“一窝蜂”。村民们听说我们工作组进村了,每人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自留山”和数量比较多的“责任山”,当然是件十分高兴的事。因此工作也十分支持与配合。什么地点,什么林种拿来分“自留山”由村民们自行讨论决定,利山村最后决定每人分些毛竹山作为“自留山”,以四口人为一家计算,约可分得一亩毛竹山为“自留山”。村民们说,毛竹一是可以挖笋吃,二是可以砍竹自己用,三是还可挖笋与砍竹卖些小钱用。所以定为毛竹山为“自留山”。分了“自留山”的第二天便有人去管理起自家刚刚分来的“自留山”了……

由此可见,当初群众对落实生产责任制的积极性之高。群众说,生产责任制是早落实早见效,迟落实迟见效。一个多月的林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工作,群众是欢迎的,时间是过得快的,但生活是十分清苦与难忘的。那时的利山村是破旧与脏、乱、差并存,跳蚤、臭虫也十分普遍,一进利山村给我的印象是生产非常落后与农民生活非常困难,纯粹是一个破旧落后的穷村庄。

二进利山为“皇粮”

我第二次进利山村大约过了7年左右的时间,是1989年前后。那时,我因工作需要调任丽云区公所区长。当时,由于农村全面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生产情况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但那个年代还需向农民收取“皇粮国税”,同时计划生育还是抓得相当紧。村民们说,我们区、乡、镇干部到村里去一是要粮,二是要钱,三是要“命”,叫“三要”干部。那时,少数村民对交公粮,为了国家的

建设交税收还存在着一定的想法。有了想法,思想不通,上级政府不去催,农民便当然不会自觉地来交公粮、交税收。特别是交公粮,千家万户都得交,多少年来公粮都是由农民送到国家粮库上交。

在那个年代,少数村庄、少数农民,政府不去催,农民就不来交,催收“皇粮”在那几年时间里,便是我们区、乡、镇干部的一项主要任务了。“要命”,当然就是计划生育。那个年代计划生育也是区、乡、镇干部一块非常难啃但又不得不啃的“硬骨头”。当时我们抓一胎放环,二胎结扎。那几年刚刚改革开放,有不少人外出经商开办企业,所以工作起来难度特别大。因为我在利山村有过分自留山、责任山的工作经历,也认识一些农民群众,有些群众基础,因此,那年我接受了去利山村催收“皇粮”与开展计划生育的双重任务。

去了利山村,催收“皇粮”工作开展还算顺利,计划生育工作虽然有些麻烦,但也能开展下去,当然那个年代农民还很穷。由于落实了责任制,村民们饭是吃饱了,也不用吃地瓜丝等杂粮了,但整个农村农民生活还是十分清苦的。我二进利山与一进利山总体印象差不多,只是农民生活稍稍地有些变化,能吃饱肚子,但整个村庄还是十分落后,还是一幅“脏、乱、差”的样子。

三进利山为“旅游”

七八年前,我省开始抓美丽乡村建设,利山村幸运地作为畲族小山村第一批列入了计划,家家户户都把自家的小洋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致富,先修路。国家拨款修通并加宽了石侯村至利山村的公路。2018年1月开始,每天还开通了七班公共交通汽车。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变,去利山村欣赏荷花的团队与散客不断增加,去那里开现场会的也不断增加,利山村村民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前任党支部书记徐连发跟我们说,今天他们的生活来之不易。回想起工作之初,首先他们得

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动员他们拆旧房,建新

房,按照村里统一规划,外墙全村统一形式与色调,政府按比例补助部分款项,内墙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

大多数村民无钱怎么办,银行统一按各家各户具体情况给予贷款,因此每家每户都欠上三五万元债。村民们说,未见猪仔先造猪栏,搞旅游,不知道哪个朝代有客人来……七八年过去了,现在群众体会到了,当初贷款还清了,不负债了,假如今天再去造房子的话,一是那点钱不够了,二是时间耽搁了,哪能像今天一样集中精力去招待客人。

其次是做土地流转承包工作,七八年前,他们村里决定拿出五六十亩土地流转,统一承包种荷花。一是改变村庄面貌,二是搞旅游,欣赏荷花。村民们担心没有客人来怎么办?可事实证明:利山这个小盆点,四周山边统一的房子,中间大片五六十亩的美丽荷花,真正实现“平日客不断,节假日客多多,家家忙”的好现象。

如今一是每年每亩八百元的承包款及时兑现。二是村里有条件的近三分之一人家办起了农家乐。农产品就地销售,剩余劳动力周边打工。办农家乐的农户一般年收入四五万元左右,最好的每年有十五六万元。目前利山村几乎没有一户有债务,多数人家还有存款,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村一级设施,如文化礼堂、会议室、接待室等齐全。利山村作为中心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下两万元。当我们问及利山村下步有什么打算时,老支书徐连发笑着说,这要看新任党支部书记兰剑青同志了,兰剑青同志年轻,有文化,思想开拓。我相信,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利山的明天肯定会更加美好!村民的生活肯定会更加安康!

作者系莲都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莲都区政协文史征集编审员。